

建國初期基督教中國化的歷程與路徑： 以“三自宣言”為中心*

李華偉

[提 要] 1950~1958 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基督教中國化的開端,奠定了基督教在新中國的發展路徑和制度框架。無論周恩來與吳耀宗等基督徒領袖的談話,還是中共中央的內部文件,都指出推進基督教革新、實行三自是肅清西方文化侵略的重要步驟,是“反帝政治鬥爭”的重要部分。由此看來,實行三自不僅是中國教會擺脫西方控制和影響的必經歷程,而且還是收回國家主權的必由之路。也只有經過三自,中國基督教教會才能“變成一個道地的中國教會”,基督教中國化之路才真正開啟。建國初期基督教中國化的目標並不是要化掉基督教,而是要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和影響,引導基督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領導信教團體和群眾與全國人民一起建設新中國。總結歷史,我們發現化什麼、怎麼化、誰來化、政府的角色和定位、目標為何等是基督教中國化的關鍵問題。

[關鍵詞] 三自宣言 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 神學中國化 反帝愛國 國家主權

[中圖分類號] B92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3 - 0090 - 11

要研究建國初期基督教中國化的基本情況和大致歷程,必須重回歷史現場,才能更好地瞭解各方的立場及其抉擇。

新中國成立前後基督教的實際情況如何呢?^①據不完全統計,建國前,“基督教有大小教派 70 餘個,分屬 121 個外國傳教差會(其中美國差會約佔一半),教堂 2 萬餘座,教徒約 70 萬人”。^②到底哪一個差會、哪一個派別才能代表中國基督教界?在基督教界的眾多派別中,1922 年成立的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是唯一的全國性的基督教團體。然而,協進會的領導機構、人員、資金受西方影響頗深,其在建國後的走向深受國內外各方勢力的關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大多數外國傳教士選擇留在新中國繼續自己的傳教工作。儘管選擇繼續留在新中國,但西方傳教士對新政權持觀望態度者居多。他們留心來自各方的消息,以之作為觀察新政權的窗口。與此同時,新生的政權也在打量着這些西方傳教士、基督教會和中國信徒,

*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統一戰線視角下農村基督教治理研究”(項目號:20ZDA026)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抗戰時期中國教會合一運動研究”(項目號:18BZJ031)的階段性成果。

並已開始團結其中的先進分子。

一、中國共產黨對基督教的態度與基督教三自革新的籌備

1. 邀請吳耀宗等人參與新政協籌備會和首屆全國人民政協會議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邀請吳耀宗等民主人士共商國是。吳耀宗參加了新政協籌備會。不過吳耀宗並不是以宗教界的身份參加政協籌備會,而是以民主人士的身份被中共中央選中的。^③

1949年9月21日全國政協成立之後,吳耀宗等5人以宗教界代表的身份參會。吳耀宗在政協會議的發言中表示:“在《共同綱領》裡面,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是確定了的。我們也要用盡我們的力量,把宗教裡面腐惡的傳統和它過去與封建力量、帝國主義的聯繫根本剷除”。^④吳耀宗表達了對黨的大政方針的擁護和支持,與民主人士一起為新中國建設奮鬥的願望,也表達了對革新宗教、切斷宗教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聯繫的決心。

2. 中國共產黨對基督教的態度與工作方針

為向基督教界傳達全國政協會議的精神,並瞭解基督教界對新中國的態度以及基督教遇到的困難,吳耀宗與劉良模兩位政協委員與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的吳高梓、青年協會的涂羽卿以及艾年三組織了為期一個月的訪問計劃,訪問了杭州、南昌、長沙、漢口、武昌、開封的基督教教會,傳達全國政協會議以及《共同綱領》的精神。

訪問之前,吳耀宗等人曾給各地教會團體發函,要求就教會事工、教會經濟、教會與差會的關係、地方教會團體的聯合等問題進行研究。訪問的過程中,吳耀宗發現基督教會面臨不少問題。吳耀宗認為這些問題部分是由於《共同綱領》中宗教信仰自由的條款沒有得到落實,但“大部分是由於基督教本身的錯處與弱點”,“主要的也是由基督教本身負責的”。^⑤儘管如此,吳耀宗等人仍然希望由中央政府下文通令保護基督教以解決基督教面臨的困難,並表達了面見周恩來總理的願望。周恩來總理於1950年5月2日、6日、13日三次組織座談會,與吳耀宗等人討論中國基督教問題,出席座談會的有中共中央、政務院有關負責人和基督教界的領袖。在談話中,周恩來亮明了中國共產黨以及政府對基督教的看法。這些看法,與1950年4月13日,周恩來在面向黨內統戰幹部召開的全國統一戰線工作會議的講話精神一致。

座談會上,周恩來為新中國對宗教的態度定下了基調,“我們主張,在《共同綱領》的基礎上,信教的,不信教的可以共存”。^⑥與此同時,周恩來指出,“基督教最大的問題,是它同帝國主義的關係問題”,“宗教團體本身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要建立自治、自養、自傳的教會。這樣,基督教會就變成中國的基督教會了”。^⑦這就是說,建國初期的中國基督教會並不是屬於中國的教會,而是深受帝國主義控制與影響的教會。

顯然,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問題,不一定能得到參加現場座談的基督教領袖的認可。因此,在三次談話中,周恩來都重複點出這一話題。在5月13日晚上11時開始的持續四個小時的談話中,周恩來做了進一步的解釋,“在宗教界肅清帝國主義影響,並不是說宗教界的每一個人人都做了帝國主義的工具。在個人來說自己感覺沒有被利用,但是帝國主義主觀上有所要求,他們利用宗教團體,乃是事實。廣大教徒有時不免也被利用。這一點,我們非說清楚不可。這個問題說清楚了,對教會只有好處”。^⑧

現場的座談會只留下了周恩來講話的要點,基督教領袖在座談會上的發言,我們已很難知曉。

不過，從周恩來一再重複、解釋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問題，可以看出，基督教領袖對這一說法和判斷仍有疑問。正是面對基督教領袖個人和他們所代表的廣大基督徒的疑問，周恩來在 5 月 13 日再次做了語重心長的解釋，他說：“我再重複一次，帝國主義利用宗教團體的問題，我們要做這樣的解釋：分清主觀與客觀，客觀是存在了的；分清少數與多數，事實上反動分子是極少數。”^⑩周恩來的指示，代表了中共中央對基督教問題的態度和立場。換言之，基督教在新中國不能再持超政治的立場，而必須向新中國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⑪在此前提下，才能在《共同綱領》的基礎上，實現信教和不信教者的共存。

既然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聯繫是難以迴避的關鍵問題，基督教團體該如何處理這一難題呢？周恩來強調，“基督教既然要清算同帝國主義的關係，自力更生辦教會，那就不應該再向國外募捐。我們要有自己辦教的準備”。^⑫這只是指解決自養問題。更重要的是，按照周恩來所指示的方向——“宗教界內部要通過自我批評，把自己的工作與組織進行檢討和整理”。這是對整個宗教界的要求，基督教新教無疑是被要求最先開展這一工作的宗教。在周恩來看來，這一原則性的工作，對基督教界是有好處的，“把這件工作做好了，帝國主義就不能再利用宗教團體了。這也就是宗教界的自衛”。^⑬

3. 尋求共識與合作基礎：吳耀宗等人的努力與中共中央的支持

尋求共識，爭取團結，既是中共中央和周恩來賦予吳耀宗等人的使命，也是吳耀宗等人對基督教界負責任的態度。與周恩來等中共中央和政務院各相關部門的領導三次集中座談之後，吳耀宗改變了看法。^⑭他不再希望由政府通令保護基督教，而是着手從基督教自身做起。第三次座談會之後不久，吳耀宗即馬不停蹄，與基督教界的領袖人物涂羽卿、劉良模、艾年三等去西安訪問基督教團體，繼續發揮橋樑的功能。

為了團結大多數，並尋求大多數團體領袖的簽名，主要由吳耀宗執筆的《中國基督教今後努力的途徑》一文（即“三自宣言”的前身）之第五修正稿於 1950 年 5 月 11 日完成。宣言稱：“基督教傳到中國不久以後，帝國主義便在中國開始活動，又因為把基督教傳到中國來的人們，主要的都是從這些帝國主義國家來的，基督教同帝國主義，便在有意無意、有形無形之中發生了關係。”^⑮這一說法淡化了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關係，然而，這是基督教界的普遍認識，不如此敘述，難以獲得教界的支持和認同。^⑯

周恩來注意到第五次修正的宣言版本比過去多了一個序言，而且這一序言“把基督教同帝國主義的關係說得很偶然”，與中共中央對基督教與帝國主義關係的定性距離較遠。然而，1950 年 5 月 20 日，在只有中共中央、政務院等領導參加的內部談話中，周恩來雖然對吳耀宗的修改表達了不同的意見，但允許其“一個字不改，照樣發表”。周恩來特別指出，“宣言裡說的話和我們說的話不一樣，我們也不需要宣言和我們說的一樣。這樣便於團結群眾”。^⑰

在此前後，吳耀宗仍與周恩來保持着直接聯繫。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50 年 6 月 1 日，周恩來致電吳耀宗說，“（寄來的《中國基督教今後努力的途徑》一文）基本方針是好的。它打開了中國基督教會及其團體今後在《共同綱領》基礎上在人民政府領導下的新的努力途徑”，望以此精神“勸導中國基督教代表人物響應這一主張，以利基督教教會的革新”。^⑱周恩來希望該宣言能得到更多教會領袖的響應和認可。

正是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大力支持下和周密部署下，在作為橋樑的包括吳耀宗等人在內的基督教領袖的審時度勢和堅持下，基督教革新運動獲得了越來越多基督徒的支持和擁護。

二、《三自宣言》的公開發表與三自革新的發起

不過,這一宣言要想獲得更多基督徒領袖的認識,就必須做更多的工作。這些工作究竟應該由黨和政府來做,還是應該依靠基督教領袖來做呢?中共中央專門為此向省級黨委組織發佈了指示,要求政府不得包辦,而應由有愛國心的信徒在政府支持下開展工作。¹⁸

基督教界存在兩種勢力:推動三自革新的力量和反對三自革新的力量。在當時,推動和公開贊同三自革新的人士是少數。吳耀宗等基督教領袖對此現狀比較清醒,周恩來對可能遇到的困難也有先見之明,因此,要求採取穩步推進的方針。在5月13日的談話中,周恩來表明了態度:“我們認為,宗教界開展加強團結運動是去腐創新。對於帝國主義的罵,我們不怕。至於宗教界本身的反響,我們要注意,要逐步地提高他們的覺悟。我們希望,大家團結起來,爭取主動,解決問題,使基督教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觀感一新。”¹⁹

如前所述,1950年5月份,周恩來總理與基督教領袖進行了三次座談。在政府的支持下,以吳耀宗為代表的基督教領袖主動開啟了“三自革新”的艱難歷程。

1. 異議者:三自革新的反對者

吳耀宗的觀點自始至終並未得到所有人的認可,海內外對其觀點持有異議者並不少見。其中中華聖公會和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的態度最具代表性。在三自宣言徵集簽名時,中華聖公會主教們全部沉默不語,沒有在宣言上簽字。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更是主動開展活動,希望改變三自革新的方向。作為中國基督教界最大的建制派團體,協進會在當時的中國基督教界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一舉一動不僅影響着國內基督教的發展方向,也受到世界基督教協進會乃至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密切關注。

1949年11月,19位教會領袖以簽名信的方式向外國差會表達了仍然需要外國傳教士“在艱難的環境中來工作與服務”的訴求,同時,希望差會將教會政策的決定權和經濟管理權交給中國教會負責人。這封簽名信,為差會和西方政府之間的關係進行解脫,並強調教會一直對現實採取超政治的立場,力圖擺脫關於基督教成為帝國主義侵略工具的指責。1950年5月,北美基督教差會聯合會在覆信中對此表示歡迎,希望以此作為基督教革新的替代方案。信中確認“差會工作從未與政府政策發生任何直接聯繫”,並表示,“(只要)中國教會能忠於基督精神,差會願繼續予以贊助”。²⁰北美基督教差會聯合會的回信時間,與吳耀宗等人面見周恩來差不多同時。後來,北美基督教差會聯合會被定性為“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差會聯合會的覆信及其活動被視為“企圖收買中國基督教徒,反對中國教會自治、自養、自傳的革新運動,和反抗人民政府”。²¹

1950年5月29日吳耀宗回到上海,召開基督教各團體、各教會領袖和信徒座談會,傳達中央的精神,徵詢信徒對於三自革新的意見。不少協進會的團體領袖對《基督教今後努力的途徑》一文尤其是其中關於美帝國主義的表述持反對意見,甚至有人罵吳耀宗為“基督教的叛徒”。7月26日,吳耀宗遭到協進會多人的圍攻。²²協進會計劃在同年10月舉行的第14屆年會上另外搞一個宣言,以引導三自革新朝着另外的方向發展。²³在中共中央華東局的干預下,協進會的方案被終止。

2. 宣言的修改、簽名與發佈

根據徵求到的意見,吳耀宗對宣言進行了修改,完成了宣言第八修正稿即《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一文(後文簡稱《三自宣言》)。在徵集到40位共同發起人之後,1950年7月28日,吳耀宗將宣言與徵求簽名的信件寄給一千多名基督教負責人。一個月內,收到了1,527人的

簽名。²⁴

《三自宣言》由《人民日報》於 1950 年 9 月 23 日登於頭版，拉開了中國基督教三自革新的帷幕。《三自宣言》提出中國基督教“總的任務”是：“擁護共同綱領，在政府的領導下，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

《三自宣言》為基督教的革新確立了兩條基本方針：“（一）中國基督教會及團體應以最大的努力，及有效的方法，使教會群眾清楚地認識到帝國主義在中國所造成的罪惡，認識到過去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的事實，肅清基督教內部的帝國主義影響，警惕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以培養反動力量的陰謀。同時號召他們參加反對戰爭、擁護和平的運動，並教育他們徹底瞭解及擁護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二）中國基督教會及團體應用有效的辦法，培養一般信徒愛國民主的精神，和自尊自信的心理。中國基督教過去所倡導的自治、自養、自傳的運動，已有相當成就，今後應在最短期限內，完成此項任務；同時提倡自我批評，在各種工作上，實行檢討整理，精簡節約，以達到基督教革新的目標。”²⁵歸納起來，這兩條方針的主要內容是肅清帝國主義的影響，實現三自，革新中國基督教。

同日發表的《人民日報》社論《基督教人士的愛國運動》肯定了《三自宣言》對於中國基督教的意義，指出：“這是基督教人士應有的使中國基督教脫離帝國主義影響而走上宗教正軌的愛國運動”，“這個運動的成功，將使中國的基督教獲得新的生命，改變中國人民對於基督教的觀感，因為他們使自己的宗教活動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活動劃清了界限，而不互相混淆”。社論旗幟鮮明地指出，中國基督教的《三自宣言》和三自革新運動為天主教乃至整個中國宗教界樹立了榜樣，三自革新運動的方向就是整個中國宗教界的方向。社論說，“我們相信 1,500 多位基督教人士的宣言，不但將為愛國的基督教徒所擁護，而且也將為愛國的天主教徒所響應。一切宗教的信徒們都可以由此得到一個正確的方向，只有朝這個方向走，宗教界才可能建立起自己正常的宗教事業”。²⁶《人民日報》大張旗鼓地發表社論支持三自革新運動，為中國基督教界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三自宣言》的發表，逐步得到更多信徒的支持。從 1950 年 9 月到 1951 年 4 月，簽名的信徒達 18 萬，佔中國基督徒總人數的 18%。至 1953 年，在宣言上簽名的信徒已達 40 萬，佔全國基督徒總人數的 40%。

3. 積極宣傳，擴大共識，形成更大範圍內的統一戰線

對於基督教是否是“洋教”、是否是帝國主義的工具這一富有爭議的問題，吳耀宗指出，由於西方傳教士所宣傳的福音大多是個人福音，“這種福音，因為脫離現實，很容易與反動力量打成一片”。²⁷因此，他得出結論說，“基督教過去與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相結合，是不容否認的”。

“三自宣言”發佈後，吳耀宗積極宣傳三自革新政策，希望這一主張得到更多基督徒團體和領袖的支持。吳耀宗利用《天風》這一平台，推動三自革新的深入發展。在“三自宣言”發佈一周左右，吳耀宗發表《展開基督教革新運動的旗幟》，介紹了推進三自革新運動的必然性和宣言發佈的過程。吳耀宗強調指出，基督教界必須認識到社會上一般人士對基督教的成見以及基督教面臨的困難，主要責任在於基督教自身，只有割斷與帝國的聯繫，“低頭懺悔，急起直追，恢復耶穌的福音本來的面目”，才能使基督教成為“新時代中一個積極建設的力量”。²⁸

三、基督教中國化領導機構的成立與三自的推進

1. 在抗美援朝鬥爭中，肅清美國的影響，提前實現自養

1950年6月25日,美國操縱聯合國悍然發動朝鮮戰爭,並逐步將戰火燃燒至中國邊境地區。此時,在西方差會及其在華基督教事業中,美國的勢力最強。基督教界如何處理與美國的關係成為焦點。

為了統一全國人民的認識,中共中央於1950年10月26日發佈內部指示,要求加大相關宣傳工作,“使全國人民對美帝國主義應有一致的認識和立場,堅決消滅親美的反動思想和恐美的錯誤心理,普遍養成對美帝國主義的仇視、鄙視、蔑視的態度”。²⁹《人民日報》於11月1日發表《開展抗美援朝的政治教育》,要求“特別着重於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法西斯思想,肅清帝國主義長期在中國人民中所傳播的一切有害的影響”。³⁰12月初,全國各地城市中的青年學生掀起了反帝愛國的遊行活動,《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希望“愛國的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熱烈地響應反帝愛國運動,加緊時事政治學習,控訴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欺騙,從根本上認識美帝國主義這個萬惡敵人,肅清美國奴化思想的遺毒”。³¹

隨着抗美援朝戰爭的開展,美國單方面於1950年12月16日宣佈管制中國在美國的公私資產,中國於12月28日宣佈了對等的措施。12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第65次政務會議通過了郭沫若副總理所作的《關於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報告》。該報告制定了四條處理方針,要求接受美國津貼的宗教團體完全自辦,並要求“政府對於他們的自立自養自傳運動應予以鼓勵”。³²在政府的鼓勵和支持下,接受外國經濟援助的教會逐步提前實現了自養。在政務院的會議之後,吳耀宗聯合上海的基督教領袖發表了共同宣言,對中央的政策表示堅決支持,³³起到了政府與信徒之間的橋樑作用。

2. 成立三自革新運動籌委會,領導全國基督教的三自革新運動

為進一步推進基督教界的反帝愛國運動和宗教革新運動,中共中央於1951年3月5日發佈了《關於積極推進宗教革新運動的指示》。該指示強調指出,基督教和天主教界的自立革新運動的主要目的是“肅清帝國主義對我文化侵略的影響”,這一運動是“反帝政治鬥爭的一個重要部分”。³⁴

1951年4月16~21日,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在北京召開“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154位基督教界人士參加了會議,代表着全國31個基督教宗派和26個基督教團體。沈德溶回憶了當時的會場情況:“大禮堂取名逸仙堂,佈置莊嚴,台上中間為毛主席像,像旁兩面巨大國旗,台前懸一紅布橫幅,上有‘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宗教事務處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等字。會場兩旁有8根白圓柱,每根柱上都掛有5面小紅旗。後面空中懸掛紅布橫幅一塊,上有‘人民政協共同綱領第一章第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及示威遊行的自由權’。左面空中橫幅上的字為‘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團結一致,把一百多年來美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文化侵略最後地、徹底地、永遠地、全部地加以結束’。”³⁵該次會議規格極高,政務院副總理郭沫若出席並作形勢報告,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主任陸定一作講話,郭沫若副總理、中共中央統戰部李維漢部長等出席晚宴。

會議召開的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了《徹底割斷基督教與美帝國主義的聯繫》的社論,指出“中國基督教教會為要與帝國主義徹底割斷聯繫,必須認真推行‘三自’運動。首先,必須實行教會自治,就是要把教會的行政權真正掌握在中國人手裡。為此,應首先與美國差會以及大部分由美國津貼的差會立即斷絕關係;這些美國差會也應立即停止在中國的活動,並撤出中國國境。與自治相聯繫的是自傳問題……這就是說,中國基督教的傳教工作,應該完全由中國教士來擔負。要實現自治自傳,就必須實現自養。就是應當用中國人自己的錢,來辦自己的宗教事業,堅決拒絕接受帝國

主義的津貼”。^③

會議通過了《中國基督教各教會各團體代表聯合宣言》。宣言要求“(基督教會)最後地徹底地永遠地全部地隔斷所有與美國差會及其他差會的一切關係”。會議宣佈,自1951年起,中國基督教各教會各團體不再接受美國的津貼。

會議期間,中國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籌備委員會成立,由吳耀宗擔任主席。會後,吳耀宗撰寫《中國基督教的新生——出席“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的感想》一文強調,“帝國主義不只通過經濟關係對中國基督教發生影響,它也通過其他的關係產生影響;並且通過這一切的關係,去進行反革命的活動”。由此,吳耀宗總結說,“如果我們要肅清帝國主義的影響,粉碎帝國主義的陰謀,我們就應當完全割斷中國教會與外國教會的關係”。^④

會議期間,開展了對美帝國主義的“控訴運動”。1951年4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開展基督教徒對美帝國主義的控訴運動》,指出“這一經驗,值得推廣到全國基督教團體中去,在全國基督教徒中普遍展開控訴美帝國主義的運動,以提高廣大教徒的政治覺悟,鮮明地劃清與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界限”。此後,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開展了控訴運動,既推動了協進會自身的巨大轉變,^⑤也在信徒中造成了較大的影響。據統計,1951年,全國133個城市的基督教會及團體舉行的規模較大的控訴大會達228次之多。^⑥

3. 力求團結:從三自革新運動到三自愛國運動

1954年7月,在北京舉行的首屆中國基督教全國會議上,吳耀宗做了《中國基督教三自革新運動四年來的工作報告》,對基督教三自革新運動的情況進行了回顧與展望。吳耀宗宣佈,三自革新運動開展四年以來,中國基督教在人事、行政和經費等方面,已基本割斷與帝國主義的聯繫,初步實現了三自。吳耀宗號召全國信徒,“遵守憲法和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會公德,同時劃清是非善惡的界限,進一步肅清帝國主義與舊社會的邪惡影響”。^⑦會議向全體中國基督徒發出倡議和號召,要求“在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領導下,緊密團結,為反帝愛國和教會自治、自養、自傳的徹底實現而努力”。^⑧

會議肯定了三自運動取得的成績,並斷定:“中國基督教教會及團體已基本擺脫了帝國主義的控制,逐步成為中國教徒自己主持的宗教團體。”為了團結更多的信徒,吳耀宗將“三自革新運動”改為“三自愛國運動”。在本屆會議上,吳耀宗被選為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會上成立的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作為基督徒與政府之間的橋樑,是中國基督教界的全國性組織,對全國的基督教活動進行規劃與引導。反帝愛國和實現三自,是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中心任務。

四、基督教中國化的主體、路徑與制度設計

中國基督教界在紀念三自愛國運動50週年時,曾將三自愛國運動的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1950~1966年;1979~1998年;1998年至今。^⑨第一階段中1950~1958年是新中國成立後基督教中國化的開端,奠定了基督教在新中國的發展路徑和制度框架。

深入建國初期基督教中國化的歷史現場,既能清晰看到歷史長河的主流,也能看到歷史長河的支流;既能聽到逐漸清晰地成為主流的聲音,也能聽到曾經主流的聲音慢慢變得嘈雜並漸趨消失。

總結建國初期基督教中國化的歷史,不難發現以下幾個問題最為重要:化什麼、怎麼化、誰來化、政府的角色和定位、目標為何等。

“化什麼”涉及基督教中國化的階段性目標和內容。建國初期的基督教中國化,主要是肅清帝國主義在基督教的影響,並去掉基督教中與社會主義社會不相適應的內容。

“怎麼化”涉及如何做的問題。有步驟地成立基督教中國化的領導機構,制定計劃、循序漸進,建立國內外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是建國初期推進基督教中國化的歷史經驗。建國前,中共中央邀請基督教界民主人士參加政協籌備會議,讓他們參與《共同綱領》的修訂,參與建國大業。1950年9月23日,由《人民日報》發表《三自宣言》並發表社論,正式拉開了新中國成立後基督教中國化的帷幕。1951年在處理涉外事務時,應基督教界的要求,推動成立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籌委會,作為領導抗美援朝和三自革新的領導機構。1954年,由基督教界正式成立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在這一過程中,由基督教界作為主體,盡可能團結最廣大的信徒,爭取更多信徒的支持,並對外做好解釋和說明工作,以建立國內外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

“誰來化”涉及基督教中國化的主體。是以政府為主體,還是以基督教界為主體,這是不同的路徑,效果也截然不同。由建國初期基督教中國化的歷史經驗可知,基督教中國化的主體是基督教界,是由基督教界的愛國領袖帶領基督教界對基督教進行革新,讓基督教在社會主義新中國煥發出新生機。

基督教中國化不僅是基督教界要處理的問題,政府管理部門也有責任。政府部門在基督教中國化中的角色和定位是什麼呢?根據建國初期的歷史經驗,政府部門負責的是兩項事務:發現、選拔愛國愛教的宗教領袖人才;涉及與宗教事務相關的大政方針和外交事務。選擇由吳耀宗等人參加政協籌備會,並到全國基督教界傳達政協會議精神、調研基督教遇到的問題,這是政府部門曾作出的最為重要的決定之一。政府出面處理的涉及基督教的大政方針和外交事務,大致有周恩來總理與基督教領袖的三次座談、《人民日報》刊發《三自宣言》、1950年10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第65次政務會議通過的《關於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報告》、1951年4月由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宗教事務處出面組織的“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等。此外,還有華東局在關鍵時刻對基督教協進會第14屆年會籌備會的介入,這在關鍵時刻確保了中國基督教界最大的組織能夠按照三自的方向推進,而不是走上歧路。

化什麼、怎麼化、誰來化的問題,都取決於基督教中國化的目標是什麼這一根本問題。建國初期,基督教中國化的目標在周恩來總理關於基督教問題的四次談話以及中共中央關於基督教問題的兩份指示(1950年8月19日、1951年3月5日)中清晰可見。周恩來指出,“我們主張,在《共同綱領》的基礎上,信教的、不信教的可以共存。我們要團結和照顧到各種社會力量,使大家各得其所,同心協力,建設新中國”;“我們只要求宗教團體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肅清帝國主義的影響。我們不搞反宗教運動”。^③中共中央的內部指示明確指出,“我們現在的任務,不是進行群眾性的反宗教運動,而是領導人民大眾,堅決實現共同綱領,實現土地改革,爭取財政經濟的根本好轉”。^④由此可見,基督教中國化的目標並不是要化掉基督教,而是要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和影響,引導基督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領導信教團體和群眾與全國人民一起建設新中國。

三自的實現是基督教中國化的階段性勝利。朝鮮戰爭的爆發促使中國基督教會提前實現了自養。1951年基督教三自革新籌委會的成立和1954年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成立,標誌着自治的基本完成。而自傳的關鍵是神職人員的培養和教育,1952年金陵協和神學院的成立標誌着自傳的制度性保障已經初步形成。改革開放以後,基督教活動恢復,又成立了基督教協會負責全國的教務工作。在1980年召開的中國基督教第三屆全國會議上,丁光訓對三自做出了評價,提出“三

自成就巨大,三自任務未了”,並對教會以後的發展目標提出“三好”,即“自治要治好、自養要養好、自傳要傳好”。

新中國成立以後,基督教中國化面臨的首要問題是政治適應。正如周恩來在座談會中所說,“諸位在政治上站穩了腳跟,便毫不會受到歧視,只有這樣才是出路”。^④在政治上站穩了立場,改變了中國人民對基督教的觀感,摘掉了“洋教”的帽子,走上自治、自養、自傳的道路,只有如此,“基督教會就變成中國的基督教會了”。在政治適應的基礎上,組織制度的中國化、人才培養的中國化、禮儀中國化、神學思想的中國化才有可能。

神學思想的中國化是最有難度的一個領域。陳澤民於 1999 年撰文指出,“在這世紀之交的時刻,我們中國基督教將以怎樣的精神面貌進入 21 世紀? 我們能否和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的神學思想”。^⑤由此可見基督教神學中國化之重要性。建國初期,基督教神學中國化的探索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上帝的內在性,這是神學中國化探索的新基點。作為愛國者和基督徒,吳耀宗一直試圖從神學來調和基督教與愛國的關係。在上帝觀上,吳耀宗強調上帝的內在性。他認為,上帝一直內在於世界,與信徒一起參與歷史。由此,吳耀宗眼中的基督教是入世、救世的,歷史就是上帝顯現自身的場景,他說:“上帝的旨意是在歷史中運行着的,因為歷史的運行,無論是怎樣曲折難測,至終它是要彰顯上帝的旨意的”。^⑥由此,吳耀宗順理成章地認為,逃避現實的、只追求個人得救的基督教,不符合上帝的旨意,也難免受到大眾質疑和誤解。

吳耀宗強調上帝的內在性,強調上帝與人同在。他在《黑暗與光明》一書中指出,中國解放戰爭的勝利是上帝祝福的事業,上帝默許了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新中國的成立是合乎上帝旨意的劃時代的大事件。

新中國成立後,基督徒首先面對的問題是:領導中國人民翻身、解放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是不是好人、“義人”,這些義人與教會“因信稱義”的神學之間的矛盾如何調和? 吳耀宗堅持“一切的善都從上帝而來”,強調“遵行上帝的旨意就是行善。行善的人不管他有沒有基督教的信仰,都是上帝所悅納的”。^⑦對教會之外善行的肯定打破了“教會之外無救恩”的說法,為基督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的和諧相處提供了神學基礎。

第二,基督教神學中國化的制度建設有了新進展。對於三自和基督教中國化來說,“誰來傳”、“傳什麼”是最為關鍵的。對基督教神學中國化的重視,促使吳耀宗極為關注神學生的教育工作。1952 年 1 月,吳耀宗在出席聖公會中央神學院結業典禮時,發表了題為《怎樣創造基督教新神學體系》的演講,^⑧寄希望於這些未來的教牧人員能創發出適應社會主義社會和新中國的神學。基督教神學中國化的重要保障是新中國成立的金陵協和神學院和燕京神學院。1952 年,華東地區的 12 所基督教神學院聯合組成了金陵協和神學院,自此以後,金陵神學院承擔起培養教牧人員和探索神學中國化的重任。^⑨

毋庸置疑,如何對待新中國是中國基督教界必須直面的首要的神學和現實問題。國家宗教事務局王作安局長對這一問題做了深刻的分析,他說:“1956 年,基督教界在《天風》雜誌上展開了一場神學討論,主要討論兩個問題:一是基督徒應該怎樣對待世界? 二是基督徒和世人的關係。這兩個問題實際上是教會與國家、信教與不信教群眾之間的關係問題,在當時主要就是如何對待新中國的問題。”^⑩1956 年舉行的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決議指出,“中國的解放和中國的建設都清楚地顯示了上帝對中國人民聖善慈愛旨意”,這次會議將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作為中國教會的當代使命和“時代見證”，這就逐漸解決了教會與國家的問題。在《天風》雜誌開展的大討論中，吳耀宗旗幟鮮明地提出，“上帝就是愛，愛是從上帝來的，我們應當彼此相愛。上帝的旨意，就是愛神、愛人、愛和平、愛真理、愛正義、團結合作、反對戰爭、壓迫和虛偽，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②這就為信教與不信教群眾之間的團結合作關係從神學上做了合理的論證。此外，“上帝就是愛”也為繼任的基督教領袖丁光訓所繼承並發揚光大。^③

1980年代至今，中國基督教界比較有影響的神學思想有“愛的上帝”、“宇宙的基督”、“直探耶穌”等，^④在上帝論、基督論、人論、救贖論等方面都有值得關注的探索。所有這些探索，都是在1950年代基督教中國化的基礎上做出來的。不過，與西方神學的系統性和思辨性不同，中國教會的神學偏重道德層面，“其基調乃是由‘上帝是愛’的上帝論和‘宇宙的基督’之基督論來確定，從而其追求和要彰顯的是‘愛的神學’，強調與當代中國社會文化相適應，達成一種‘愛’的和諧”。^⑤

70多年之後，回顧建國初期基督教中國化的歷程，不難看出，基督教界實行的三自愛國運動，事關國家主權。無論國家領導人還是宗教事務管理者都一致讚同，建國初期三自和基督教中國化的中心環節無疑就是擺脫帝國主義對中國教會的控制。這一定位，得到吳耀宗等人的認可。在美國宣佈凍結中國在美國的公私款項之後，中國政府統計了國內基督教界接受美國津貼的情況，這些數據說明，中國基督教確實深受西方基督教的影響。事實上，吳耀宗早在1948年發表的《基督教的時代悲劇》中就以大量的事實說明中國基督教是“美國式基督教的翻版”。無論周恩來與吳耀宗等基督徒領袖的談話，還是中共中央的內部文件，都指出推進基督教革新、實行三自是肅清西方文化侵略的重要步驟，是“反帝政治鬥爭”的重要部分。由此看來，實行三自不僅是中國教會擺脫西方控制和影響的必經歷程，而且還是收回國家主權的必由之路。也只有經過三自，基督教教會才能“變成一個道地的中國教會”，基督教中國化之路才能真正開啟。

①詳細情況可參考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編：《訂正中國基督教團體調查錄》，上海：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1950年。

②羅竹風主編：《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問題》，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第34頁。

③⑬⑭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輯），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185~186頁；第186頁；第409~410頁。

④吳耀宗：《黑暗與光明》，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49年。

⑤吳耀宗：《基督教訪問團華中訪問記》，上海：《天風》，第9卷第9期（1950年3月11日）。

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周恩來著，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5~186頁；第182頁；第185頁；第186頁；第183頁；第187頁；第187頁；第186頁；第185~186頁；第185頁。

⑩在座談會上，周恩來提出了判斷宗教團體的標準，“一個宗教團體，對新中國有無益處，要以愛國與民主兩個條件來鑒別。如果這個宗教團體在政治上是擁護《共同綱領》的，是愛國與民主的，那麼這個宗教團體便是對新中國有益的”。《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182頁。

⑬吳耀宗表示：“周總理所作的清楚的分析，卻給了我們一個深刻的印象和鮮明的啟示。這個啟示是什麼呢？用一句簡單的話來說，這個啟示就是：‘基督教應當自動地肅清帝國主義在它裡面的力量和影響。’”吳耀宗：《展開基督教革新運動的旗幟》，上海：《天風》，第10卷第13、14合期（1950年9月30日）。

⑭⑮⑯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政策法規司編：《中國宗教團體資料》（第一輯），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3年，第443頁；第475頁；第482~483頁；第485頁。

⑰儘管吳耀宗早在1948年發表的《基督教的時代悲劇》中就承認中國基督教已經被帝國主義利用作為

文化侵略的工具,但基督教界普遍在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問題上認識不清,大部人將這種關係視為被動的、不自覺和偶然的。連吳耀宗也認為這種文化侵略是被動的和不自覺的,他說:“如果我們的思想路線是和現在西方基督教的思想路線是一樣的,我們的确是無形中變成了帝國主義和文化侵略的工具”。吳耀宗:《基督教的時代悲劇》,上海:《天風》,1948年4月10日。

①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45頁。

②⑩《北美差會聯合會聲明宣教立場》,上海:《天風》,第9卷第24期(1950年6月24日)。

③③⑦吳耀宗:《基督教革新運動學習手冊》,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52年,第64頁;第84~97頁。

④②⑨羅偉虹主編:《中國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4年,第655頁;第668頁。

⑤③具體情況,參見宋軍:《變局中的抉擇: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歷史的終結(1949~1951)》,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17年。

⑥④吳耀宗:《展開基督教革新運動的旗幟》,上海:《天風》,第10卷第13、14合期(1950年9月30日)。

⑦⑤北京:《人民日報》,1950年9月23日。

⑧⑥《基督教人士的愛國運動》,北京:《人民日報》,1950年9月23日。

⑨⑦吳耀宗:《人民民主專政下的基督教》,上海:《天風》,第8卷第4~5期(1949年8月20日、27日)。

⑩⑧吳耀宗:《基督教革新運動》,上海:《協進月刊》,第9卷第4期(1950年12月16日)。

⑪⑩《開展抗美援朝的政治教育》,北京:《人民日報》,1950年11月1日。

⑫⑪社論:《進一步開展反帝愛國運動》,北京:《人民日報》,1950年12月14日。

⑬⑫郭沫若:《關於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報告》,北京:《人民日報》,1950年12月30日。

⑭⑬④沈德溶:《吳耀宗小傳》,上海: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1989年,第58頁;第61頁。

⑮⑭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85

~89頁。

⑯⑮沈德溶:《在三自工作50年》,上海: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2000年,第3頁。

⑰⑯《徹底割斷基督教與美帝國主義的聯繫》,北京:《人民日報》,1951年4月16日。

⑱⑰《上海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舉行控訴大會,控訴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罪行》,北京:《人民日報》,1951年6月9日。

⑲⑱《愛國愛教,同心邁向新世紀——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五十年的總結》,上海:《天風》,2000年10月。

⑳⑳陳澤民:《中國基督教應以怎樣的面貌進入21世紀》,上海:《天風》,1999年7月。

㉑㉑吳耀宗:《大時代中的上帝觀》,成都:青年協會書局,1940年,第11頁。

㉒㉒吳耀宗:《因真理得自由》(續),上海:《天風》,1954年第7期。

㉓㉓丁光訓主教指出:“不講神學的宗教,是低級和原始的;不思考問題的宗教,一定是同理性格格不入的。”丁光訓:《丁光訓文集》,南京:譯林出版社,1998年,第240頁。

㉔㉔王作安:《中國的宗教問題和宗教政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198頁。

㉕㉕吳耀宗:《向耶穌學習》,濟南:《田家》,1956年第15期。

㉖㉖丁光訓主教在吳耀宗等前輩的基礎上提出了“上帝是愛”、“宇宙的基督”等神學觀,對教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改革開放以後,在神學中國化方面,中國基督徒已出版了一系列著作,主要以金陵協和神學院的神學家為代表,如丁光訓、陳澤民、汪維藩等。

㉗㉗段琦:《奮進的歷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562~567頁。

㉘㉘卓新平主編:《中國宗教學40年(1978~2018)》,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415頁。

作者簡介:李華偉,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博士。北京 100732

[責任編輯 陳志雄]